

访谈录

← (上接5版)

因为你卷入太深了。

文汇报:您刚才提到一个社会理论,能否谈谈您怎样看待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们所有人都在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,从社会学、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借用概念对我们非常有帮助。但我们总是会看到,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泛。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历史和人类的多样性带进来,这个形式,也是一种道德要求——看到古代历史中的个体,给这些个体以发声的权利,倾听他们,不仅仅说你是属于这个或那个社会团体的。要看到他们个体的分歧、争论,看到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,个人如何面对整个生命进程遭遇的困境。

在这里我要提到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·布克哈特(Jacob Burckhardt)。布克哈特对其他人、其他古代文化都心怀敬意,这是相当重要的,这也是人文学术给社会的一项基本的、重要的贡献。因为现代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他人的理念之上,我们也试图教出这些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接受所有东西。每个社会都需要规则,需要定义什么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。你必须能够理解另一方的想法,必须对其他人抱有基本的尊重。

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,于是我们更关注具体的行为体

文汇报:德语世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,相比英语和法语世界有什么特色?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们很看重行政架构,我们对英国学者不重视法律感到非常失望。我们对神学问题非常感兴趣,我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哲学传统。所以确实是很不同的。还有一点,实际上语言对你表达的内容有很大的塑造。我们用德语写作,也用英语,但是用英语表达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以及,我们有一些特定的词汇,不是能够完美对译到英语的,例如前面我说的“Kunstwollen”。

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,对法律有全然不同的概念,法国人和德国人对于总体的、精

确的成文法非常看重。我们没有判例法。

在古代早期,罗马法主要是判例法。罗马法里也有矛盾之处,因为大部分法律其实都是皇帝对提问的回答。法官或其他人定义问题,然后询问解决方案。或是从皇帝这里得到回答,或者是查阅相关的评论。皇帝的回应和评论在古代晚期被收集起来,而那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试着整理成体系的东西。现在,欧洲大陆的历史研究多强调法律架构,而盎格鲁-萨克逊的同仁们更喜欢研究判例,也更倾向于接受特例。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可能更接近于古代,但他们是不是总是正确,我不太确定。特别是,有些评论固然包含清晰的法律概念,但这些评论被看得跟法律同等重要,从我们现代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奇怪的。虽然德国的法学教授也很喜欢写评论,但那没有约束力,只是供给法官参考用。所以,盎格鲁-萨克逊的方法要比大陆的方法灵活得多,在这方面,我想我们和法国、意大利人更接近。

文汇报:我看到您写过关于罗马社会娱乐与娱乐从业者的文章,讨论演员和角斗士。您也写教父和皇帝。在这么多的人里,您为什么会以这些人为写作对象呢?要知道还有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不是人。

哈特穆特·莱平:我想这可能还是和代际有关。因为我们的老师非常注重社会架构,注重抽象发展,于是我们就会对具体的行为体投入更多。

对娱乐从业者的关注,其实有一个很个人的原因——我一直都很想成为一个歌剧演唱家。我对这类文化一直很感兴趣。娱乐业的这一类史料大多出自纪念某人的拉丁铭文,读这些铭文,你会了解到,在丧葬铭文里、在他们叙述自己成就的诗歌里,他们看重的是什么。



18世纪的利巴尼乌斯画像



科斯马斯绘制的
世界地图

在社会主流的眼中,他们被视为怪人,但他们还是很想把自己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史料中的这一有趣张力。

文汇报:您的专著《古代的遗产》(2010)广受欢迎,为公众写作对您来说算是一种公共服务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确实,这本书是为更广泛的读者,而非专家写的。我想要着重说明的是,在西方古代史里,古代并不是欧洲,但总是被视为欧洲传统;你没法脱离古代理解欧洲,但又不能把古代削足适履履欧洲的概念,因为古代还包含伊斯兰的传统。我宁愿使用的是“欧洲-地中海”一词。我们所称的大部分欧洲传统,实际上是西欧传统,跟欧洲东部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。东正教跟天主教、新教很不同。现代俄罗斯的行政体制和东正教会之间仍有很强的联系,这在西欧是不可能的,但这也属于欧洲传统。

我很重视为公众写作——我们是受公家资助的,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话要说。有一些写古代的人没有专业知识,通常比我们写得更流利。但我想还是我们更可靠。并且,如果我们有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特权,

如果我们想鼓励年轻人投身同样的事业,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在中学课堂里呈现——那么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重要性之所在。

写作公众读物也是一项乐趣。我还写过给孩子的古典民主呢。有些十来岁的孩子会写信给我。收到这些信真是开心极了。在给公众和专业研究者写作之间,其实有一个中间地带——写给其他学科的同仁看。我就写给神学家看。例如,我最近要在欧洲神学家大会上发言,展示我的想法,肯定会受到很多批评,但一定也会极有收获。

文汇报:21世纪以来,古典学研究有些什么新的视角?是否有类似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这样的重大变化?

哈特穆特·莱平:德国有一句著名的谚语:历史应该是将欧洲地方化(provincializing Europe),和/或不再以欧洲为中心(decentering Europe)。这是关于将古典学去古典化的(declassifying classics):我们看到,古代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,不止是古典文化。在这个意义上,古典学不是欧洲的,而是全球的。

有一个人们称之为“重新语文学化”(re-philologization)的进程。文本和文本细节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这和语言学转向有关。另一个极大影响本领域的转变,与历史学总体的转向有关:空间转向(the spatial turn)。地理学,是历史和考古学之间的地带,变得越来越重要了。我对这一领域没那么关心,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:了解人们如何想象世界,看看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地图。有一幅古代地图《波伊廷格古地图》(Tabula Peutingeriana),看起来很像现代的导航系统:你会看到城市之间的连接,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方式。

去研究那些现在不怎么时髦的领域,是我们的责任,你必须

完整地保存这些知识。否则,只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,是没法看到完整图景的。因此,为了抵抗沉浮导致的知识消亡,你必须非常保守:保存现在已有的,保存知识,保存传统。

德国的学术体系以制定长期计划闻名,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“希腊铭文集成”,一直持续到今天,而且质量保持不坠。这一传统是非常特别的。固然很难维持,但我们到今天还是努力坚持,虽然他们真的不够入时。

文汇报:那么在艺术史方面呢?彼得·伯克(Peter Burke)使用图像和视觉材料作为历史证据,这是一个重大的方法变革吗?

哈特穆特·莱平:大多数古代史学家都是受语文学的训练,有些是受考古学的训练,但理想的是每位古代史学者都能处理艺术制品,因为艺术品可能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。

我会带学生们去考古艺术博物馆,向他们展示一些重要的花瓶和铭文。你必须如解释文本一样,批判性地解释这些艺术品。许多学生觉得考古学相对轻松,跟处理文本的难度不好比,因为面对艺术品没有什么语言壁垒。然而,你必须教会学生们,这些艺术品可以有多复杂。

视觉材料很重要,因为古代史的某些阶段,如荷马之前的时代,是非文字史料占主导——几乎没有什么文本,但考古材料很多。每个古代史学者都被期待在其研究里包含物质文化。如果你想讨论一位罗马皇帝及其各种呈现,那么钱币、画像、雕塑这些都得要看。

彼得·伯克做的研究很棒,很出色。但是从方法上来说,对我们不是新鲜事,对于那些研究更晚近时代、但同样接触很多考古材料的学者,也不那么新鲜。